

政治领导人演讲的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近体化理论的案例分析

张天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要：话语体系的要素包括话语主体、话语目的、话语空间（架构）和话语策略等。本文以澳大利亚外长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稿为语料，依据近体化理论，从空间、时间和价值观三个维度对政治领导人如何构建话语空间、塑造国家形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还探讨了框架等话语策略及对其解读的范畴化、隐喻等识解操作。构建话语空间、运用话语策略、分析识解操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读话语强制说服目的，即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

关键词：话语体系；话语策略；话语空间；近体化理论；国家形象

中图分类号：H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16)05-0028-08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6.05.005

政治话语是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研究的重点，而政治领导人话语又是政治话语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外很多CDA研究的文献都是以政治领导人的演讲稿为语料分析对象，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有话语历史（discourse-historical）、辩证-关系（dialectical-relational）、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文化、社会认知、认知语言学、发展心理学等（Fairclough, 1989; Chilton, 2004; Wodak, 2001; Cap, 2013; Hart, 2011, 2014a、b等）。政治领导人话语研究对于分析国外政治话语的构建方式、隐性和显性策略、意识形态传播，最终探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模式和有效策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在梳理话语体系相关要素的基础上，拟在批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视角下，具体从近体化理论分析澳大利亚外长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演讲稿，探究政治领导人是如何构建话语空间，应用话语策略，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的。

1 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即话语实践，包括话语主体、话语目的、话语空间、话语策略等要素。话语主体是话语目的、话语空间和话语策略的实施者，而话语主体、话语空间和话语策略都是围绕话语目的展开的。此外，话语空间与话语策略也是相辅相成的，围绕话语空间，可以应用不同的话语策略。

政治话语中的话语目的主要是强制说服（coercion）。强制说服是Chilton（2004）在政治话语研究中提出来的，强制说服被定义为一种影响他人信念、情感和行为的意图，这种意图以符合他人利益的方式进行（Hart, 2010）。强制说服是语篇制造者（text-producers）和政治交流（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终极目标，强制说服影响着语篇消费者和他们的行动，影响的程度和级别取决于语篇制造者的地位和权力（Hart, 2010）。Chilton（2004）区分了两种强制说服，认知强制说服（cognitive coercion）和情感强制说服（emotive

作者简介：张天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句法学、语言政策。E-mail: zhangtianwei@bfsu.edu.cn.

coercion)。

在话语实践中，语篇的强制说服目的通常隐性地体现在各种话语策略中，话语策略是显性地实现语篇强制说服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合理性 (legitimization) 是判断话语策略的重要标准。常见的话语策略主要有指称策略、述谓 (predication) 策略、近体策略和合理策略等。当然话语策略是动态的，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策略，比如Hart (2010)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话语策略，区别了结构构型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策略、框架 (framing) 策略、识别 (identification) 策略和定位 (positioning) 策略。语篇制造者为了达到强制说服目的，会采取各种话语策略，而话语策略的实施必然会涉及语言的认知和理解过程，这个过程往往被概念化。探究政治语篇中所操纵的话语策略和其背后的认知机制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也是近年来CDA研究的热点之一。

话语空间是话语体系的支柱，话语空间为话语体系提供了框架，话语策略的应用是围绕话语空间展开的，话语空间是相对固定的，而话语策略围绕话语空间，针对不同的主题会有不同的类别。

话语主体包括语篇制造者、语篇相关者和语篇消费者。语篇制造者是话语体系的主导和构建者。

上述关系如图1所示，图1中话语主体主要指语篇制造者。本文探讨的重点是话语空间的构建和话语策略的应用。

话语体系 (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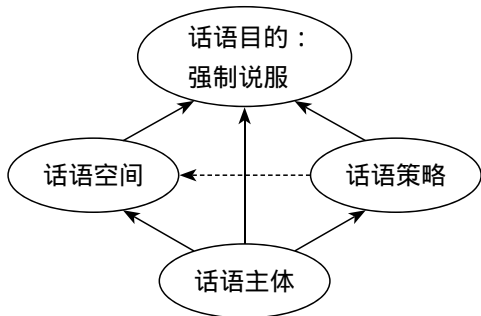


图1 话语体系要素关系图

2 近体化理论

近体化 (proximise/proximising) 概念首先由Chilton (2004) 提出，然后Cap (2005) 将其名词化 (proximization)。该理论是在话语空间理论 (discourse space

theory) (Chilton, 2004)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两个理论有很多相通之处。话语空间理论分为时间 (temporal)、空间 (spatial)、认识论 (epistemic) 和情态 (modality) 四个维度。近体化理论在其基础上，将其简化为时间、空间和价值观 (axiological) 三个维度，并将每个维度的分析进一步细化为不同的类别，见表1-3的分析。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近体化进行过研究，如近体化与合理化的关系 (Cap, 2005, 2006)，Hart (2010) 探讨了近体化与强制说服、述谓和隐喻的关系，Dunmire (2011) 从政治体裁 (genre) 的视角分析了近体化理论。Cap (2006, 2013) 认为近体化理论是一种修辞语用 (rhetorical-pragmatic) 策略，该理论认为语篇制造者为了达到强制说服目的，让受众感觉其行为合理化，从空间、时间和价值论的三个维度将参与者 (actor)、情景或事件视为对自身的威胁。近体化理论的核心是指示中心 (deictic center)，围绕指示中心可以分为空间轴线 (上轴线)、时间轴线 (左右轴线) 和价值观轴线 (前轴线)。在话语空间中，当指示中心被概念化后，一些指示词可以位于不同的轴线上，凸显不同的意识形态，如here & there、now & then、us & them、right & wrong等，这些关系如图2所示。

话语事件参与者的所在地点、参与时间和基本价值观是话语场所 (discourse stage) 的指示中心，也是锚定点 (anchorage point)。话语参加者及其价值观是语篇中心的内部指示中心成分 (inside deictic centre, 以下简称IDC)，而其他实体被概念化为指示中心以外的外部指示中心成分 (outside deictic centre, 以下简称ODC) (Cap, 2006, 2013)。近体化理论以IDC和ODC为两个基本参照点，以空间、时间和价值观为维度，通过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副词短语、时体指示语和相关句式来实现。近体化理论作为一种认知语用理论，也是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上，以自我为中心，区分内外。在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各种理论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具有互补功能，单一理论无法全面解释某一语言现象，可以考虑理论框架或模型的糅合，抑或引入理论外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做进一步探讨，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参考 (Zhang & Di, 2016)。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话语空间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近体化理论作为本文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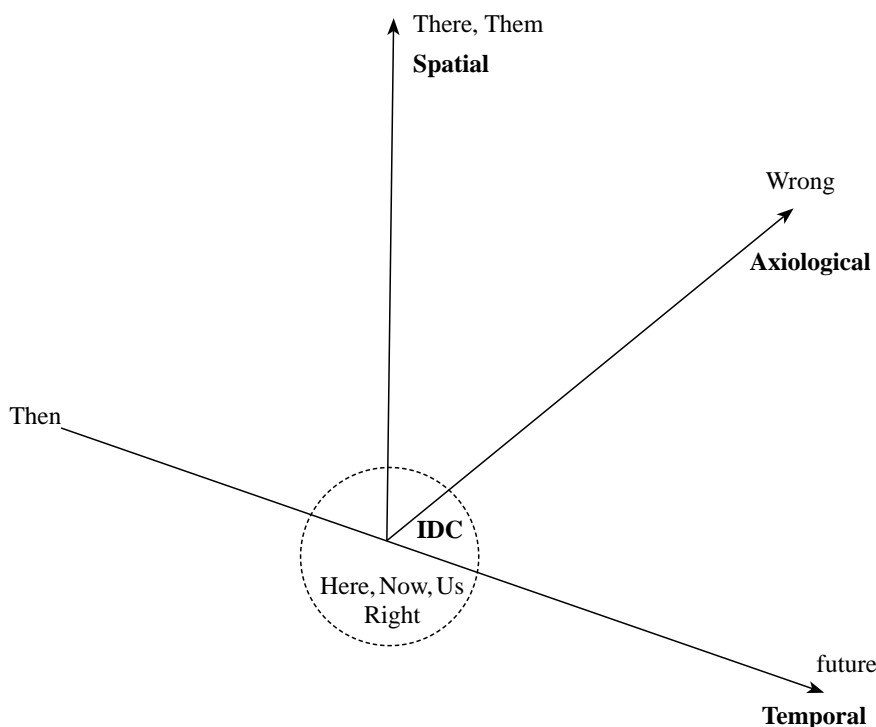


图2 近体化理论基本模式图(修改自Hart, 2014: 165)

3 政治领导人演讲的案例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政治领导人的话语体系, 政治领导人话语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构建国家形象。本文语料选取澳大利亚外长Julie Bishop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演讲稿(以下简称演讲稿)。主要内容包括对联合国工作的肯定、澳大利亚对联合国的支持、澳大利亚对反恐工作的贡献、《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与澳大利亚面临的工作与挑战等, 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演讲稿中既有澳大利亚对过去工作的评述, 对当前问题的关切, 更以未来发展为导向, 阐述未来面临的威胁、对未来行动的承诺等, 其中《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打击恐怖主义是演讲的重点。该演讲稿总共1880字, 通过词频分析, 我们发现高频词分别是“我们”(包括we、our、us)47次, “澳大利亚”23次, “发展”11次, “人权”9次, “人道主义”8次, “安全”7次, “达伊沙(Daesh)”5次。本节将依据近体化理论, 从空间、时间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建立话语空间分析模型, 探讨演讲稿是如何构建澳大利亚国家形象的。

3.1 空间近体化分析

作为一个识解操作, 空间近体化聚焦于ODC的破坏性影响, 并将这种影响识解为迫不及待、不可避免的影响, 除非IDC内部会

有先发制人的行动(Cap, 2013: 74)。根据Cap(2013)的分析框架, 在演讲稿中, NP或VP可以被识解为六类空间近体化, 如表1所示。在话语实践中, 澳大利亚及其相关的群体或事物被识解为IDC, 通过Australia, we, Australian peopl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等来表现, 这些形式基本上表现为两类, 一类是国别化名词, 另一类是第一人称代词, 应用这两类词更能显示语篇构建的主体性。而与恐怖主义或敌对国相关的Daesh, terrorism, the North Korean regime则被识解为ODC, 由于内涵和外延不同, 这些NP可以分为不同的级别, 如terrorism中包括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和Daesh。根据VP的不同性质, VP对指示中心的影响可以分为移动(motion)和行动(action)两类, 移动类VP侧重过程, 而行动类VP侧重结果。当NP被定义为抽象概念时, ODC对IDC的影响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影响的预测, 程度相对较轻, 如harm, depredation等, 另一类是对影响的实际效果, 程度相对较重, 如scourge表示祸害或灾难, 类似的表达还有catastrophe、tragedy等。通过空间近体化分析, 演讲稿构建澳大利亚为正义的化身, 以Daesh为代表的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威胁, 正在蔓延和肆虐, 在将来会带来巨大危害, 为此, 澳大利亚将会致力于打击一切邪恶势力。

表1 空间近体化分析框架

空间近体化分类	代表词	特点和表达的国家形象
NP被识解为话语空间的IDC	Australia, we, Australian peopl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	话语空间的主体, 代表正义、自由、民主等
NP被识解为话语空间的ODC	Daesh, terrorism,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violent extremism,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	与话语空间主体相对应的对立面, 代表恐怖、邪恶、极端主义等
表示移动 (motion) 的VP被识解为ODC向指示中心移动的标记	wreaking, devastating, prevail	对立面带来威胁的渐进过程, 为此澳大利亚将不惜人力、物力与之战斗, 反衬其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
表示行动 (action) 的VP被识解为ODC对IDC影响的标记	destroy, combat, defeat, devastating	对立面带来威胁的结果, 同上
NP被定义为抽象概念, 指ODC对IDC影响的预测 (anticipation)	harm, depredation	预测对立面未来可能带来的威胁, 同上
NP被定义为抽象概念, 指ODC对IDC影响的效果 (effect)	scourge of war, global scourge of violence	对立面带来威胁的实际效果, 同上

3.2 时间近体化分析

时间近体化将“现在 (Now)”, 即语篇制造者的“现在”作为指示中心。围绕“现在”, 时间近体化包括两种概念转移 (conceptual shifts), 一种是过去到现在的转移, 另一种是将来到现在的转移。Cap (2013: 116) 将时间近体化分为五类, 如表2所示。第一类指NP中包括a、an等不定代词, 如A day等, 将ODC识解为实际、客观的影响。第二类指在话语实践中, 对比使用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 识解为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一直持续, 如(1)所示。

(1) Australia's firm response to people smuggling, and **continued** cooperation with our regional partners, **have saved** thousands of lives of those who would otherwise have succumbed to the false promises of people smugglers.

(1) 中使用过去时continued, 表示澳大利亚过去一直坚定不移地与周边国家合作, 而对比使用现在完成时have saved, 表示这种正义、人道主义行为带来的效果和持续的影响是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否则这些人可能会在人口走私中丧失生命。

第三类指使用名词化的NP, 预设ODC可能会在未来任何时间产生影响, 这种预设也包括将来对现在的影响, 即为应对未来的威胁, 需要我们现在就采取相应预防措施。如(2)。

(2) Terrorism today is a global **threat**.

(2) 中threat指: 当前的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 这种威胁预设着恐怖主义对现在或将来会产生影响。

第四类指包括情态动词的VP, 预设ODC的影响会从现在起并影响到未来, 比较(3)和(4)。

(3) We **continue** to advocate for a political solution that **can** bring an end to the conflict in Syria, and we support UN envoy de Mistura's efforts towards this end.

(4) We do not **believe** any transition option **should** be rejected, all permutations of a political solution **should** be assessed with clear eyed realism.

(3) 表示澳大利亚继续坚持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冲突, 并支持联合国驻叙利亚特使Staffan de Mistura所做的努力, 使用can表示

虽然叙利亚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政治解决方式才能最终结束冲突，政治解决方式会在现在和将来持续。

(4) 指澳大利亚不认为任何过渡选择都应该被拒绝，所有政治解决方案都应该经过事实的检验。Should指现在或未来都不应该拒绝或检验，这种影响在现在和未来间持续。与(3)比较，should的语气更强烈。(3)和(4)构建了澳大利亚自由、平等、正义的国家形象。

第五类指话语形式中包括平行对比，识解为与现在相比，未来可能是

相反的或有优势的，如(5)所示。

(5) I believe that Australia would bring to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the same principled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hat distinguished our 2013-14 Security Council term.

(5)的背景是澳大利亚正积极争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席位，以树立其领导者的地位和形象，目前澳大利亚只是非成员国的观察员身份。句中使用believe，表

示澳大利亚如能成功竞选理事会成员职位，将来会给人权理事会带来重要和实用的发展路径。同理可以分析(4)中believe。

通过时间近体化分析，演讲稿构建了恐怖主义自过去开始肆虐，对现在造成巨大危害，也对未来带来威胁，这种威胁正在步步紧逼，对现在和将来都有影响。而澳大利亚有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还具有平等意识，坚持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并力争在联合国及附属的人权理事会中发挥更大作用。

表2 时间近体化分析框架

时间近体化分类	代表词	特点和表达的国家形象
NP包括非限定性描述，将ODC识解为实际的影响 (actual impact acts)	A day	客观描述
话语形式中对比使用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识解为对未来的威胁或影响	Australia's firm response to people smuggling, and continued cooperation with our regional partners, have saved ...	衬托澳大利亚对国际社会的已有贡献和高度责任感
NP包括名词化，识解为ODC会预设着将来任何时间产生威胁	Terrorism today is a global threat .	对立面带来的威胁，衬托澳大利亚将与其战斗，维护世界和平
VP包括情态助词，识解为ODC的影响会在现在和将来间持续	We continue to advocate for a political solution that can bring an end to the conflict in Syria./We can realize.../ should.../would	衬托澳大利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平等、自由的形象
话语形式中包括平行对比，识解为与现在相比，未来可能是相反的或有优势的	I believe that Australia would bring.../ We do not believe any transition option should be rejected...	衬托澳大利亚自由、平等、民主的形象

3.3 价值观近体化分析

价值观近体化指对ODC和IDC意识形态冲突 (ideological conflict) 的识解，即NP被识解为三种方式：

(1) IDC的积极价值；(2) ODC的消极价值；(3) 在话语形式中不限于一两句话，而是通过词汇语法短语 (lexico-grammatical phrases) 的线性排列，在IDC空间中构建ODC的消极意识形态 (Cap, 2013)。在演讲稿中，当NP被识解为IDC的积极价值时，常用词汇有freedom, equality, peace, justice等；当NP被识解为ODC的消极价值时，常用

词汇有terrorism,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depredation等；当在IDC空间中构建ODC的消极意识形态时，常用的线性序列为NP指称ODC价值——NP指称ODC和IDC冲突较远的可能性——NP指称ODC和IDC冲突较近的可能性——NP指称ODC和IDC的冲突四个级别。上述关系如表3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演讲稿中，我们发现了与Cap (2013) 分析相反的排序，比较(6)和(7)。

(6) Daesh is wreaking devastating harm on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d destroying the **world's** heritage, in gross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asic concepts of morality.

(6)中NP指称ODC的价值，即在IDC空间中构建的ODC消极意识形态，其空间距离不是由远及近，而是由近及远，由大到小，按照个人、家庭、社区和世界的顺序进行线性排列。而Cap (2013) 的分析中曾举例如下：

(7) This evil [radicalism and extremism] **might not have reached**

us yet but it is in plain sight, as plain as the horror sight of the collapsing towers./We live in the nuclear age, when foreign threats can **cross the oceans and set our land on fire within minutes.** (转引自Cap, 2013: 123)

(7) 中might not have reached 和cross the oceans and set our land

on fire within minutes都表明ODC在IDC中构建的空间距离是由远及近。

我们认为在IDC空间中构建ODC的消极意识形态的空间方向性,既可由远及近,也可以由近及远,只不过是表达的需求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式。(6)为了表示Daesh的紧迫感和巨大的危害性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采取由近及

远。(7)着眼于未来,预设着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会步步急逼,威胁时刻存在,如不采取措施预防和及时应对,危机感会越来越强,因而采取由远及近。总之,在价值观念维度,演讲稿中构建的澳大利亚国家形象是积极、正义,处理国际事务时,有责任感,打击恐怖主义不遗余力,乐于奉献。

表3 价值观近体化分析框架

价值观近体化类别	代表词	特点和表达的国家形象
NP被识解为IDC的积极价值	freedom, equality, peace, justice	正义、自由、民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NP被识解为ODC的消极价值	terrorism,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depredation, violent extremism,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	对立面的邪恶、暴力、恐怖、极端主义
话语形式不局限于句子,而是通过词汇语法短语的线性排列,在IDC空间中构建ODC的消极意识形态	NP指称ODC价值——NP指称ODC和IDC冲突较远的可能性——NP指称ODC和IDC冲突较近的可能性——NP指称ODC和IDC的冲突	描述对立面带来威胁的渐进性,反衬澳大利亚的正面国家形象

3.4 话语空间模型的构建

基于近体化理论 (Chilton, 2004; Cap, 2013; Hart, 2014a), 我们试图构建演讲稿话语空间构建的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中指示中心“三位一体”,即在空间上是Australia,在时间上是Now,在价值观上是Justice。围绕指示中心,三个主要支撑轴线分别为左右轴线(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轴)、前轴线(价值观轴)和上轴线(空间)延伸而构建的话语空间表征模型。该模型以指示中心为核心,基于身体经验,构建了由近及远的模型。图中虚线椭圆内为IDC空间,椭圆外为ODC空间。

在空间近体化层面,因为Daesh在时间上是过去构建的,因此出现在模型的左上方,如图中虚线所示。Daesh在空间上的构建距离,即ODC与IDC的距离具有层级性,是一种包含关系,由近及远,分别为恐怖主义、外国恐怖主义分子和达伊沙。指示核心澳大利亚对Daesh的

态度是致力于坚定不移地打击。在时间近体化层面, Daesh过去和现在都发动了战争,战争的破坏对现在和未来有持续的影响,如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的使用。在价值观近体化层面,与Daesh相对应的价值观表述是terrorism, depredation, violent extremism, harm等。语篇制造者对Daesh构建的话语空间,如图中虚线所示。构建上述话语空间的主要目的,同前所述,是通过打击Daesh,塑造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

3.5 话语策略的应用

围绕话语空间,可以动态选择不同的话语策略为语篇制造者达到强制说服目的服务。比如在框架策略中, Hart (2014a、b) 认为框架策略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范畴化,二是隐喻化。范畴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引导受众对话篇陈述对象的认同,语篇制造者可以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和意识形态通过范畴化分类传递给受众,以达到话语目的。

在演讲稿中,澳大利亚外长将恐怖组织称为Daesh,而不是通称的ISIS,其背景是2014年12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今后不再用“伊斯兰国”称呼中东恐怖组织——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而改称为“达伊沙”; Daesh是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的英文缩写, Daesh一词与阿拉伯文中的“蹂躏”一词发音相似,用Daesh称该组织更能反映人们对它的愤怒和蔑视;另外,广大阿拉伯国家认为,使用“伊斯兰国”一词既亵渎了伊斯兰教,也会赋予该组织某些合法性(人民网,2014)。由此可见澳大利亚的意识形态与美国是很相似的,对恐怖组织采取敌对和蔑视态度。对同一事物赋予不同的称谓,即范畴化为不同的类别,可以使受众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框架,并按照语篇制造者的意图,理解语篇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此外,演讲稿中也大量使用了隐喻,如scourge of war/ violence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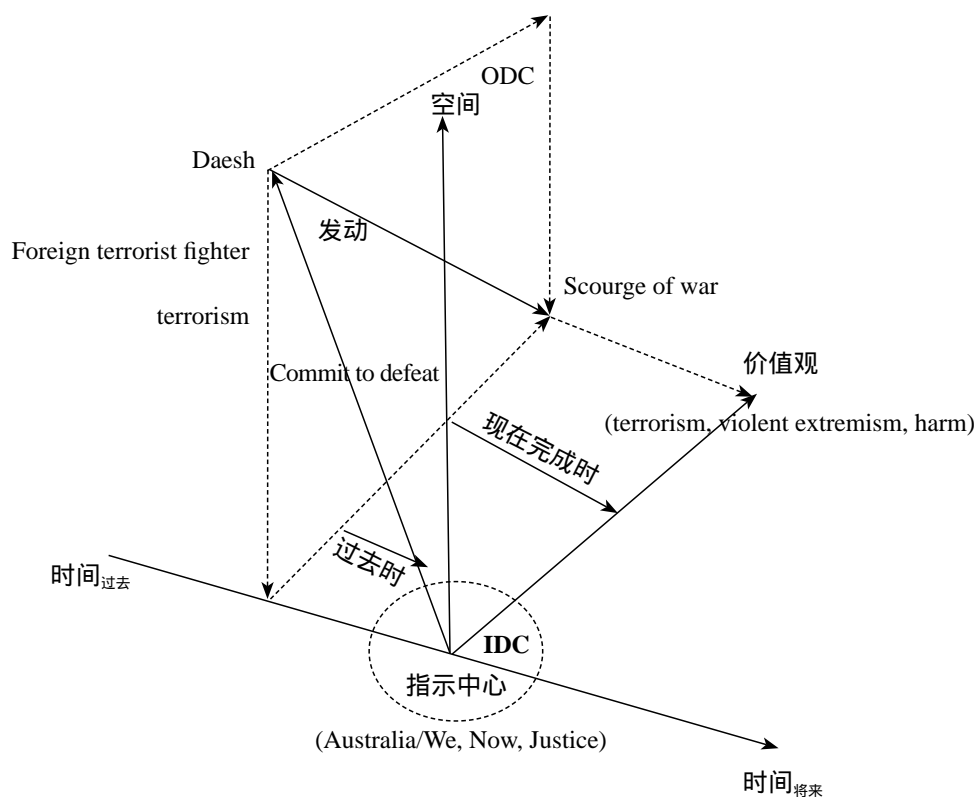


图3 演讲稿中话语空间模型

篇制造者将抽象化的原域识解为相对具体、可理解性强的目标域，使受众对语篇更容易感知和理解，进而更清晰地理解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认同和权力关系。对其他策略的应用，可见Hart (2014a、b) 和张天伟 (2016a、b)，张天伟、郭彬彬 (2016) 的详细探讨。

话语空间构建和话语策略应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强制说服目的，在演讲稿中，澳大利亚外长通过话语实践，主要构建了澳大利亚“正义、自由、平等、负责、奉献”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国家形象既有内涵，也有外延，且呈动态发展。国家形象构建的维度主要有政府、企业、城市、历史、文化等，国家形象的构建者主要有政府、企业、国民等，其中政府领导人、政府新闻发言人与外宣干部都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代言人 (范红, 2013; 程曼丽, 2007)。在演讲稿中，通过历时和共时梳理澳大利亚对联合国工作的支持，如打击恐怖主义、维

护人权、呼吁性别平等、调查马航MH17事件等，分析其话语空间和话语策略的构建和应用，澳大利亚外长构建了国家具有正义、自由、民主精神，强调权利平等，积极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奉献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不惜人力、物力等一切代价为国际社会服务。这些形象既表现为多维度，又相互交叉，上述分析与澳大利亚国家形象定位的标识语“True Australia”和国家形象标志“袋鼠”也是相吻合的。总体而言，澳大利亚国家形象的定位与意识形态与美国很类似，在话语空间中，美国和联合国都位于以澳大利亚为指示中心的IDC范围附近。

4 结语

本文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在应用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对政治领导人话语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研究，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

修补，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但是本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今后进一步探讨，其中之一是解释的主观性问题。CDA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主观性 (subjectivity) 和过度解释 (over-interpretation) 问题 (Hart, 2014a)。CDA站立于社会政治视角 (sociopolitical position)，多是基于分析者政治倾向的主观性和异质 (idiosyncratic) 解释，而不是更加客观地、基于理论驱动的、量化的解释 (Hart, 2014a)。这种主观性过强，并缺乏一定的定量分析，选料选取缺乏普遍性，不全是基于使用的真实语料，便会带来语料分析与共存文本 (co-textual) 语境和互文本 (intertextual) 语境相脱离，过度解释语料的语用效果 (pragmatic effects) 和意识形态效果 (ideological effects) (Hart, 2014a)，甚至偏离语篇制造者的本身意图。同样，认知语言学也面临对语言现象解释的主观性过强的问题，认知语言学是一种

以内省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学科，内省法的弊端之一就是主观性太强，缺乏客观和实证研究，不可证实或证伪。有鉴于此，上述共性问题也是批评认知语言学面临的主要问题。近些年，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日趋向多元化发展，既有质性分析，也有量化研究，更有两者间的混合，如语料库、心理语言学实验、多模态分析、神经认知等研究方法（Gonzalez-Marquez et al., 2006）。同理，CDA研究的方法也日益多元化（Wodak & Meyer, 2009），这些也将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论方面发展的趋势。运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政治语篇进行对比分析，在量化的基础上，进行质性分析，将是今后一种重要研究路径。本文分析的语料比较单一，只是一个国家，结合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对多个国家领导人演讲稿进行历时和共时分析，类似类型学的研究，探析国外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话语表达方式、话语空间构建模式和应用策略，归纳其共性和差异将是本研究的后续发展方向。□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2015MZD011)子课题“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国际比较及其国际传播研究”的阶段成果，并得到2016年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青年卓越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黄国文教授、文秋芳教授对论文多次悉心指导，提出宝贵建议，在此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

- [1] Cap, P. Language and legitimization: Developments in the proximization model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Lodz Papers in Pragmatics*, 2005 (1): 7-36.
- [2] Cap, P. *Legitimiz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M].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6.
- [3] Cap, P. *Proximization: The Pragmatics of Symbolic Distance Crossing*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
- [4] 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5] Dunmire, P. *Projecting the Future through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Case of the Bush Doctrin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 [6]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1989.
- [7] Gonzalez-Marquez, M., Mittelberg, I., Coulson, S. & Spivey, M. J. (eds.). *Metho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6.
- [8] Hart, C.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Discourse* [M].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0.
- [9] Hart, C. (e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 [10] Hart, C. *Discourse, Grammar and Ideology: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M]. London: Bloomsbury, 2014a.
- [11] Hart, C. Construal operation on online press reports of political protests[A]. In C. Hart & Cap, P. (eds.). *Contemporar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 London: Bloomsbury, 2014b: 167-188.
- [12] Wodak, 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In R. Wodak & Meyer, M.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Sage, 2001: 63-94.
- [13] Wodak, R.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2nd ed.). London: SAGE, 2009.
- [14] Zhang Hui & Di Weichao. Making intelligence more transparent: A critical cognitive analysis of US strategic intelligence reports on Sino-US relation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016 (1): 63-93.
- [15] 程曼丽. 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J]. *国际新闻界*, 2007(3): 141-152.
- [16] 范红.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策略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5-10.
- [17] 人民网, 美国正式宣布改称“伊斯兰国”为“DAESH” [OL].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224/c1002-26265656.html>, 2014.(2016年8月1日读取)
- [18] 张天伟. 基于进化心理学的批评话语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a (5): 78-87.
- [19] 张天伟. 《话语、语法和意识形态》评介 [J]. *话语研究论丛*, 2016 b (1): 146-152.
- [20] 张天伟, 郭彬彬.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话语策略和识解操作研究[J]. *外语教学*, 2016(6): 17-22.

A Study of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Politicians' Speech: A Case Study from Proximization Theory Approach

Abstract: Discourse subject, purpose, space and strategy are the key elements in discourse syst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ximization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discourse space and national imag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Specificall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speech addressed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Australia in UN General Assembly 70th session general debate statement from the spatial, temporal and axiological modal of proximization. The study also explores discourse strategies and demonstrates its construal operations. The main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discourse space, applying discourse strategies and identifying construal operations is to reveal the coercion and enhance the national image.

Keywords: discourse system; discourse strategy; discourse space; Proximization Theory; national image